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张维华 主编

龙涎屿往锡兰过洋牵星图 看东 西南北高低远近四面星收锡

兰山 时月往忽鲁别罗里开洋牵北斗双星三指看西南边水

平星五指一角正路看东南边灯笼骨星下双星平七指正路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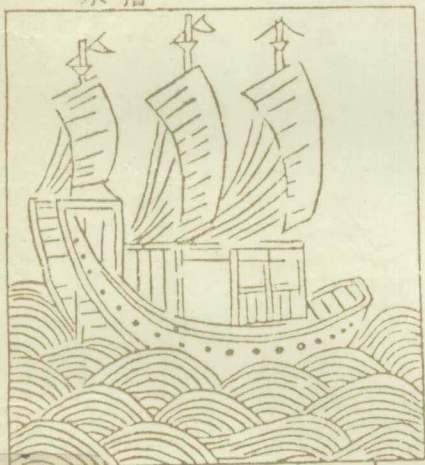
西边七星五指半平

北斗头双星平三指

一角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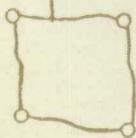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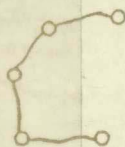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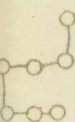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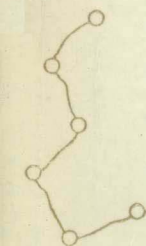
北辰星第一小星平三指

一角平水



灯笼星七指平水

西南水平星五指一角平水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张维华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112号

主 编 张维华
副主编 张志宏
撰稿人 张志宏 马 新 齐 涛
马小鹤 姚大力 魏良弢
晁中辰 陈尚胜 孙 西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张维华 主编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625 字数 400 000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204

ISBN 7-04-003693-2/K·176

定价7.35元

前 言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是中外关系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历史学科的重要分支。中外关系史是研究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交通和交涉的历史。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它必然要和其他国家和民族发生接触和交往，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国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越来越扩大，越来越频繁，在这种频繁的交往过程中，各国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了各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研究中外关系史，就是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中来考察，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通过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和世界各民族对中国的影响，证明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所要研究的就是1840年以前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间进行的政治关系，以及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创造过人类最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的落后只是近三四百年的事情，两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全面维护“朝贡体系”，不热心支持民间对外经济活动，在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崛起之后，中国的封建主义就相形见绌，显得落后了。如今，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一个先决条件便是对外开放，广泛接触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就，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促进我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以加快民族前进的脚步。

学习中外关系史，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来区分“中”与“外”

的问题。由于历史上我国疆域范围的变迁，“中”与“外”的概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在某一历史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历史阶段又融合到中华民族之中；反之，一些曾经属于“中”的民族和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有些国家在一定时间内作为藩臣与中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但也有一些并不是藩属而是通过友好交往与中国发生关系，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又往往不分主次，一概称之为“朝贡国”。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按时代的不同情况，予以历史主义的评价。

在我国历史上除了代表正统的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外，在某些时期，尤其在动乱分裂时期，各地区还出现过一些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区域性王朝。它们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以历代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更不能以汉族王朝与历史上的中国划等号，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但包括占统治地位的中原王朝，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或政权。要打破以历代正统的中原王朝即代表整个中国的观念，必须站在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立场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在中国的版图内，中央王朝与边区政权、部族的关系都是国内民族关系，而不是中外关系。以怎样的一种时空标准来划定“中”与“外”的界限呢？我们认为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范围是比较合适的。自秦汉以降，我国多民族的国家就已逐渐形成，尽管历史上在此疆域范围内各民族间有过多次的分裂和组合，但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文明也在这一版图内融合，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这一文化统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56个民族形成了团结、和睦、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研究中外关系史以此作为界定的标志是符合实际的。综观世界历史的进程，把中国放在其中来考察，这也符合整个世界历史潮流发展的总趋势。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随着奴隶制的出现，建立了国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进入了萌生时期。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周边各族的记载，《山海经》中的《大荒西经》、《穆天子传》对葱岭（今帕米尔）以东的山川风物描绘较详细，而且还记录了中国西北边境的犬戎和大月氏的一些情况。但是，由于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还十分低下，这一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还很狭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因此在记载中有些虚构和失实的部分。

降至秦汉，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生产力获得进一步发展，逐渐繁荣起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为扩大对外交往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确立，为对外交往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军事保证。张骞于汉武帝年间两次出使西域，成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强大的西汉王朝从此与他的西邻建立了关系，并同大秦（罗马帝国）建立了间接联系。东汉时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还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但因故只到达西海（估计为波斯湾）而返。公元166年，大秦商人来中国，以安敦王名义向汉桓帝赠送礼物。这样，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往来的步伐不断加快，规模也越来越大。丝绸之路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商路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同外部世界的海上交往早在秦汉以前也已开始，而有记载的官方往来则始于汉武帝。当时的中国商船由广东的港口出发，前往马来半岛，缅甸，印度次大陆和斯里兰卡等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虽处于动乱分裂之中，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并没有中断，中外关系处于一种区域性发展的状况。公元226年，大秦使者秦论到建业，受到孙权接见。西晋初年，大秦又派使者来中国。中国的养蚕术于6世纪末经波斯传入大秦。西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虽历经磨难，这时有了新的传播和发展，以

后又从中国传到朝鲜、日本。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阶段，这种变化的最明显特征是唐代在西域军事失利后，传统的陆路交通受到阻隔，而唐中叶以后，海上对外交通日渐突出，最多时与唐交好通使的达70多个地区和国家。唐王朝中央政权设立专门接待外国使者和客商的机构——鸿胪寺，又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大量输入亚、欧各国，深受外国人喜爱。唐与罗马（时称拂菻）、阿拉伯（大食）建立密切关系，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得以传入中国。而早已传入的佛教，此时经玄奘等高僧译传佛经的努力，对唐代高度发达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新罗留学生和日本的遣唐使等则把唐代文化传播到国外，出现了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

宋辽金时期，国内各区域性王朝出现，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宋与辽、夏、金时战时和，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对外交往主要在东南海路进行，其时与中国通商的亚非国家仍有50余个。至元朝，由于蒙古人的不断远征，疆域庞大，横穿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更加畅通无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紧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极其繁荣。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人伊本·拔都他的中国之行都在这一时期。

明初，虽然因“海疆不靖”，“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禁止私人对外交往，但是永乐时期派郑和于1405—1433年间七下西洋，与亚洲各国以及非洲东岸诸国的官方往来则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影响。

从郑和下西洋以前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简略史实看，中国从秦汉以降至明朝初年，这段时间的对外关系基本上是逐步发展的，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态度，中外关系犹如江海波涛，逐浪推进。中国使节、商人、僧道的足迹几乎踏遍

亚洲以及东非、北非和欧洲的部分地区。中华民族在世界古典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及希腊、罗马文明）荟萃地区所展开的一系列对外交往活动，给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增添了光彩，促进了中亚等地游牧民族和东南亚地区相对落后民族的文明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极大地推进了欧洲历史的进程。诚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欧洲资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火药炸毁了封建骑士的堡垒，指南针为欧洲的大帆船装上了“眼睛”，使它在茫茫的大洋中远航，不会迷失方向。而造纸和印刷术的传播对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加以包括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等人的记述，中国的声望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加以改造，为自己所用。自张骞通西域以后，外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量输入，封建统治阶级虽然有时加以排斥，但主流还在于吸收和利用。异民族物质、文化的引进，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至社会风俗等各方面，丰富和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

但是，从明中期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三四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步落后于西欧各国，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外部世界的态度由开放交往趋向闭关保守。明代统治者重行禁海之令，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葡萄牙、荷兰等老殖民主义者不断从东南沿海伺机侵略，陆上长城也被满族冲垮。继明亡而兴的清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实质上一直采取束缚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闭关自守政策，处于消极被动地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挑战的地位。而西方各国正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努力向外扩张殖民地和掠夺财富，中国成为他们的进攻目标，因而南有英、法等西欧殖民主义者的进攻，北有沙俄的侵略，在强大的外敌面前，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终于被彻底打败。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

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对外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以一系列的被动挨打，屈辱求和为标志，也就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范围广阔、涉及欧、亚、非、美各大洲；内容丰富，既涉及经济和政治，又涉及科学和文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如地理学、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其它科学门类。面对这样广阔的范围，这么纷繁复杂的内容，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门学科的主要脉络，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必然有它自身的规律。从古代对外交往的范围来看，陆、海两路是主要的孔道。中国对外的陆路交往形成较早，即人所熟知的“丝绸之路”。它又分为南、北二路，南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于阗、莎车，越葱岭后抵达大月氏和安息；北路经敦煌、车师、龟兹、疏勒，越葱岭后经大宛、康居到安息。丝路最终的目的地是大秦（罗马帝国）。由汉至唐，历代统治者经营西域的结果，使丝路畅通，官旅、客商络绎不绝，中国和西方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日益繁荣昌盛。封建统治者也利用这条道路，将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求得边境的安宁，保护同西方各国的往来。陆路之中，还有一条少为人注意的“草原之路”，主要是西北民族的迁移路线，也成为中国同西方来往的通道之一。海路的交通开始虽早，真正的繁荣是在隋唐及以后，至明成祖遣郑和下西洋而达于极盛，使通往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岸国家的海路贸易迅速发展。人们有时也称海上的对外交通为“海上丝路”或“陶瓷之路”，可见其具有与陆路交通同等的重要性。在海外贸易中，华侨对南洋诸国的开发以及在传播中华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应

从中外关系史（有别于华侨史）的角度加以探讨。

从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交往来看，不难发现，它主要通过民间的对外交往和官方的对外交往这两大渠道进行。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皆有民间的和官方的两种方式。按一般规律，中外关系的建立，总是先从民间的相互接触开始，然后才有官方的往来以及对这种民间往来的认可与规定。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华民族同西方各民族间的交往已经存在，这在《史记》卷一二三，张骞上书汉武帝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张骞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同时，民间交往又往往是官方交往的继续，当国家间的关系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中断以后，人民之间的交往却仍在继续不断地进行。这样，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和经济、文化交流——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的民间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就呈现为一种带规律性的趋向。陆上交通线的开辟，人民群众起着先驱者的作用，同样，海上交通的开辟，也是先由人民群众闯出来，从民间的自由交往开始。由民间进行的对外活动表面上看来是松散的、无组织的，但这与交往双方的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这种交往活动常比官方关系具有更广泛的范畴，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如异族通婚等）中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分裂动乱时期以及封建统治阶级闭关自守的年代，民间的对外活动甚至成为中华民族对外关系的主流，因之，民间交往是中外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

与民间的对外关系相比较，官方的对外交往即由统治集团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对外活动，一般都有鲜明的目的性和较强的组织性。张骞出使西域，其目的是联合大月氏

夹击匈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联络各国，扬威异域。封建王朝派出的使团是有组织的，而且有一系列对外交往的原则和策略。他们要建立的是国与国（或地区）间正式的官方关系，这种外交活动明显地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其成败不仅取决于国家权力是否强大，统治集团是否采取了正确的外交原则与策略，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目的是否符合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由于官方的对外关系往往是对民间交往的肯定和规范化，因而应该是和整个民族的切身利益相符的，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统治集团的对外交往就往往不会成功。

民间交往和官方交往这两种组织形式虽不相同，但二者之间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般地说，如果没有民间的对外关系，官方的外交活动就不大可能发生，即使建立了关系，由于缺乏广泛的民间接触作后盾，也不可能持久，最终会导向萎缩。相反，由于官方外交频繁，同样会促进民间往来的繁荣和活跃。因此，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时，对这两方面的内容都不能忽视，只有全面加以研究，才能完整、正确地再现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真实面貌。

既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对外活动，那么，除了中原王朝以外，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些区域性政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同样是中外关系史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时中华民族仍以其共同的文明形态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对各个区域性民族政权的外交活动，只要有利于中华民族，就应加以肯定。大量的异国物质、文化产品通过边疆移植到内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因为躲避战乱、被流放等原因导致大量人口的流迁，又将中原文明更多更广泛地传播到边远地区，并流向外国，所以各个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区域性政权在促进中外交往方面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不容忽视。

中外关系的发展并非孤立演进的，而是与中外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步进行的，它深受中外双方社会发展水平和基本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这种交往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平等或不平等、是友好往来或侵略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外国的地位是有变化的。然而，中国的统治集团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出发，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历代统治者往往把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的友好往来记录成君臣之间的朝贡关系。对此我们应慎重地具体分析。历史上“朝贡贸易”确实存在，而且封建帝王大多是厚往薄来，以显示自己的“仁义”与富足。但对历史上确实并非藩臣而是来进行友好交往的外部各族一律记述为“朝贡关系”那就有违于史实了。因此，对于朝贡问题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客观细致的分析，不能单就历史资料的记述一概而论。

因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的统治阶级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曾对外发动过许多次战争，如元朝时对日本的战争，存在着侵略动机，对这样的战争应加以批判和否定。同样，历史上中华民族也对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进行防御和抵抗，如郑成功收复台湾、反对沙俄在东北的侵占等，这些是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正义之战，应当加以肯定。对于各式各样的战争应作为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当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主流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族人民的和平友好交往，同时，也必须研究交恶时期的战争关系。此外，即使在战争时期，中外各族之间的交往一般也仍未间断，总以不同的方式（主要在民间）进行着。所以中外关系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方法来研究。

最后，在学习和研究中外关系史时，我们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外各族，避免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在中外交往中，既要肯定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也要承认其他国家对中国

影响。任何交流都是双向的。各民族的物质、精神文明是互相滋润的，通过交流达到融合与发展。应该承认，每一个民族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各个民族由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不尽相同，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很大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宗教、民俗等方面总会与其他民族有差别。受物质生产水平的影响，文化的发展是由低到高渐进的，在这一进程中，与社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文化历史类型也在变化，因而，文化的发展水平有高有低。但是，这种差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历史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保持绝对的、永远的先进。何况一个民族的文化即使在总体上相对落后，却并不能排斥在某些局部方面是先进的；同样，有些民族的文化从总体来看是先进的，但也不能否认其中仍有落后、愚昧的东西存在。中国的古代文明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它和其他民族的接触中，通过政治交往、商业贸易、文化交流，把自己的先进文化传播到周围的地区和国家。丝绸、陶瓷、冶铁术、养蚕术、井渠法以及四大发明等等传入中亚，西亚及欧洲，丰富了外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其物质和文化产品的发展。而我国也积极地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从宗教到科学技术，兼收并蓄，结果是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古代文明，从而使之更具活力和影响力。所以，总起来说，没有一个民族不从文明的传播中接受其惠泽。因此，研究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史，应持平等态度，否则就有违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我们要谨记周恩来总理告诚史学工作者的一段话，他说：我国有的史学家受了封建史学的毒，思想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没有外交观念，把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对邻国的错误态度作为正面的东西写进了历史，这是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1978年2月25日《光

明日报》)

上面论述到的几点，是我们在编书工作中考虑和遵循的几条原则，在这里作为提醒读者在学习本课程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下面简单谈一点学习本课程的意义。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作为一门研究中国与外部各族物质和文化交流发生发展的专门史，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对促进中国古代史的整体考察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象研究汉代历史而不研究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关系；研究明清史而不研究耶稣会传教士的来华以及西方文化的东渐，都是不全面的。凡是想要全面地研究和掌握中国古代史，就不能忽视这一部分内容。

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还具有现实意义，它将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外交活动提供借鉴和启迪。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参加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结合我国目前的状况研究中外关系史，总结一些带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启示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先进事物和科学技术，保持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通过反思，有鉴别地批判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加强我国人民与世界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为世界人民的和睦团结作出贡献，都有重要的意义。

* * *

关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我国较西方各国要早得多，中国正史中的外国传是最早记录中外交往的典籍，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欧美东方学与汉学的兴起，大致由元代东来西人之游记所引起，而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的地理大发现，使欧美对东方的研究逐渐有了兴趣，他们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掌握情况，协助统治者制定殖民政策，故不论在研究的态度上或立

论的观点上都明显地带有西方殖民的色彩，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历史烙印。17世纪以后，明末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从开始对沿海地区的考察到清初进入内地，传教活动的扩大，传教士寄回欧洲的信函、著述，欧洲在华各教会对总会的会务报告以及商务的、军事的报告等传往欧洲，这样便逐渐扩大了中西交往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因此，从本世纪30年代起，前辈学者们研习这门专史，便习惯地采用了“中西交通史”这一名称。其实从我国学者研究的地域范围和研究的内容来看，名实并不相符，而对于今人来说，继续使用这个名称更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以为“交通史”似应着重在交通运输和通讯邮传方面的研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交通路线只是这门专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研究中西交通路线是无法正确反映中外关系的历史全貌和本质的。其次，用“中西交通史”的名称，把地域范围限定在“中”与“西”之间，对于今人来说也容易误解为着重在对今日所指的西方即欧洲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从冯承钧、张星娘、陈垣、向达、方豪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并不只限于欧洲一隅，而是把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一概包括在内，几乎是作全方位的研究。再则，从中西交通史这门专史的英文名称看叫做“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直译应是“中外关系史”。因此，为使课程内容与名称更加一致，今天有必要将“中西交通史”正式正名为“中外关系史”。

然而，尽管我们的前辈学者们从30年代起便在这一领域里做了许多拓荒耕耘工作，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门专史至今仍属历史科学中的一个冷门，人才不多，成果亦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难度大，要求高，政治性强，在已往的岁月里还受到许多人为的干扰。因此使许多学者望而却步，建国40年来没有写出一部适应大学历史学科的专史教材。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国家教委为了扶植这一新兴的老学科，于1982年批准由郑鹤声、张维华两位老先生领导，在山东大学成立了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几年来，已先后培养出一批研究生。为了补充历史学科中外关系史教学中的教材空白，我们几位年轻教师在张维华先生带领下，接受了教委下达的“七五”规划中编写《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教材的任务。张先生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数十年，造诣精深，见解独到。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我们与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有关同志一起合作，提出了教材的大纲，经几次讨论并由张先生修改，按以下分工执笔编写：前言，张志宏；第一至三章，齐涛，马新；第四、五章，马小鹤；第六章1、2节、第七章及第八章的海路交流诸部分，姚大力；第六章3至5节及第八章陆路交流诸部分，魏良弢；第九、第十一章，晁中辰；第十章1、3节，第十二章1节及第十三章，陈尚胜；第十章2、4节及第十二章2、3节，孙西。附录的参考书目目录由陈尚胜、张志宏整理提供。

正当我们殚精竭虑投入教材的编写工作时，不幸张老先生溘然长逝，这对于我们编写组来说委实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抱着完成张先生未竟事业的愿望，兢兢业业地前后花了二年多时间，完成了编写任务。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原编写组成员黄靖在组织力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后因出国深造，才停止继续从事此项任务。以后由张志宏具体负责组织、联络并主持全书的统稿工作。但是由于我们接触的材料有限，尤其是理论和业务水平不高以及时间上的不甚充裕，教材中定然会有许多错漏不当之处，我们怀着诚恳学习的态度，祈求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以便将来有机会再作出进一步的修改和提高。

本书的编写工作至1991年春最后完成。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各位史学前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国内著名学者、中国历

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先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王剑英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了认真细致的审稿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书稿的质量有很大提高。山东大学历史系葛懋春先生、蔡凤书先生对本书大纲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季羨林先生为本书封面题写了书名。对以上各位先生给予的关心和支持,编写组全体同志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教材中的部分地图采自《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等著作,谨此致谢。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编写组

1988年11月